文苑笔谈

如意，在历史的时光中熠熠流彩

师正伟

“向壁悬如意，当帘阅角巾。”一提到“如意”，大家就会想到晶莹剔透、呈祥纳瑞的玉如意。如意，又名“搔杖”“握君”“执友”“谈柄”，是由中国古代的笏和“爪杖”演变而来。“爪杖”即俗称的“老头乐”“不求人”“痒痒挠”，因人手不能到之处以其代劳搔痒，可尽如人意，故得“如意”之雅号。我国古代又有记事于上的“笏”——亦称“朝笏”“手板”，以备遗忘，如意则兼二者之用。

古代，一柄经典的如意，由细长的手柄和云纹头部组成，多呈S形，类似于北斗七星的形状。如意大致可分为三种：直柄式如意，造型线条简单，为天官如意。顶端造型形似灵芝的，为灵芝如意。而以玉器、翡翠、珊瑚、玛瑙、碧玺、象牙等名贵宝石，镶嵌在珍贵的紫檀红木或者铜鎏金上的，则称为三镶式如意。1977年，山东曲阜出土了一组东周时期、与文献所记载的如意形制极为相似的牙雕残器，考古专家将其定名为“牙雕如意耙”。这件文物很有意思：长柄，一端为人手形，五指并拢内弯，样子像极了现代依然常用的“痒痒挠”。但是，它做工精致，有清晰的卷云纹，柄端为兽头形状。这种可用于搔痒的“爪杖”正是如意的起源。

除了出土文物，《稗史类编》也有记载：“如意者，古之爪杖也，或用竹木，削作人手指爪，柄长可三尺许，或背脊有痒，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意。”

如意，如意，称我心意。“如意”在古代不仅有广泛的用途，还寓意着好运和吉祥。不过，在魏晋南北朝之前，“爪杖”并不叫“如意”。魏晋南北朝时，思想空前解放，文艺有了长足发展，当时的士大夫之间流行玄学清谈，多热衷服药，药性发作时身上会痒，所以名士们“爪杖”不离手，成为上流社会彰显身份的象征。久而久之，演变为一种配饰，名士们就给它起了个雅称——如意。早在上世纪60年代，在南京出土的南朝墓壁大型拼镶砖画中，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手持如意，悠闲自如。王戎是清谈的代表性人物，也是两晋时期的一位高官，史书记载他既富且贵，而且还善于集聚财富，可见，如意是彰显他清谈的一种工具，同时又是权力与财富的标志。

“如意”，由一件挠痒痒的工具转变为蕴含文化的器物，这种繁荣一直持续到唐代。唐时，国家经济发展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百姓生活安定富足，如意不再只是通俗的搔痒工具，已经被赋予了吉祥美好的属性，逐渐进入了寻常巷陌。从百姓们到士大夫都开始视其为通灵宝物，选择在重要位置悬挂。唐代诗人李贺在《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中就留下了“向壁悬如意，当帘阅角巾”的美好诗句：“扫断马蹄痕，衙回自闭门。长枪江米熟，小树枣花春。向壁悬如意，当帘阅角巾。犬书曾去洛，鹤病悔游秦。土甑封茶叶，山杯锁竹根。不知船上月，谁棹满溪云。”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时，令匠人精心打造了一柄如意，并亲自题写“万年如意”4个大字。这柄如意后来成了唐朝皇室的镇宫之宝。可见，如意不仅寓意吉祥，更象征着皇权的延绵不绝。唐代如意造型更为考究，发展为柄身扁平，柄前端弯折如颈，柄首多见云团、灵芝、团花等造型，取平安顺遂、如意吉祥之意，制作工艺和材质都更为讲究，镂空工艺开始出现。爪杖与如意，一俗一雅，在这个时代终于走向了分离。

到了宋代，“如意”上越来越多地出现祥瑞图案，工艺也越来越复杂，材料贵重，金、玉、水晶、珊瑚、玛瑙、沉香木、骨角、奇竹等制作的如意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长度逐渐缩短，并镶嵌珠宝。如意头上雕刻的都是吉祥图案。有的被雕成两个柿子状，“柿”与“事”同音，取“事事如意”之彩；有的刻上五只蝙蝠围绕一个大寿字飞翔，“蝠”与“福”同音，取“五福捧寿”之意。灵芝，这种稀少珍贵、象征祥瑞的“仙草”也终于开启了它与如意的不解之缘。从宋开始，如意头的造型越来越像灵芝。

明代时，“如意”已经成为文人案头的文玩器物，材质上多用名贵木材，雕刻以祥云、蝙蝠等吉祥图案。这一历史时期的最大变化是造型。此前的“如意”都是一首一柄，明代开始出现首尾有一大一小两个如意头，中间为柄，奠定了此后至今“如意”的标准器型。明代著名戏曲家高濂《遵生八笺》中“如意”条记载：“近得天生树枝，磨作如意，精巧入神。复得竹鞭，树枝屈结，如意肖生，而柄亦天成，不事琢磨，无一毫斧凿痕，执之光莹如玉。其坚比铁，惜不多得。”无不可雕，天然竹木如意符合明代人对古朴自然之美的推崇。当然，正因为这个词的美好寓意，“如意”也并不仅仅是一种器物。明代诗人罗伦有诗：“逢著闲人只点头，海边同我是沙鸥。多情芳草旧知己，如意好山都上楼。”

清代是“如意”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几乎为皇家御用。宫廷里“吉利话”的礼俗促进了“如意”与“吉祥”的相依相伴。“如意”被作为宫廷贵重礼品用于进贡、赏赐、馈赠，成了“吉祥如意”的代言。宫廷造办处甚至有专门制作如意的作坊，称为“如意馆”。年节、生日、大婚等各种重要宫廷庆典上，如意都是必需品。百姓之间，逢年过节办喜事之时，也喜欢将虽不名贵但寓意同样美好的“如意”作为礼品奉上……

如今我们最常看到的如意造型一般由如意头和柄身两部分组成，主体基本上呈流线型，柄微曲，整体造型优美华丽。同时，材质上也多了金、玉、水晶、象牙、玛瑙、紫檀等珍贵材料，还用上了浮雕、镂空、镶嵌及景泰蓝工艺，这些精细华丽的纹饰，无疑增添了它的艺术收藏价值。它已经远离了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成了一种工艺品，只在历史的时光中熠熠流彩。

不过，我们也许不会忘记，北京冬奥会期间，那柄银装素裹，斜卧于崇礼山间的“雪如意”——国家跳台滑雪中心，一亮相就惊艳了整个世界，也为世界开启了一场丰富的中国文化之旅。

阅评

糖，从古至今搅动着世界

赵士铎

糖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糖却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只有皇室贵族和富甲之家才能够享用。欧洲贵族不仅沉迷于糖的味道，甚至将糖当作身份的象征。欧洲的精英们会将糖制作成精美华丽的小型雕塑，让糖与艺术成为高不可及的存在。最著名的一场糖塑雕像盛宴，来自1571年伊丽莎白王后的新婚典礼，相传每吹响一次号角，就上一道有特殊主题的菜肴，晚宴后还有甜品套餐，在当时可谓是奢华至极。

糖，从古至今搅动着世界。糖的历史不仅是甜蜜的味道，它也有辛酸与血泪。因为糖，美洲的原住民作为收割甘蔗的劳动力而被奴役，据不完全统计，有6000万人因残酷的劳动死于甘蔗田——史上最大规模的奴隶运动，就是为了生产白色黄金——糖。英国社会史学家詹姆斯·沃尔韦恩在《糖的故事》中也有句扎心的话，大意是：欧洲咖啡店里，顾客往咖啡里加糖的时候，甘蔗种植园里，无情的皮鞭正抽在奴隶的身上。

电影《旺卡》

1.

几千年以来，带甜味的食品和饮料一直是人类饮食文化的一部分。无论是用于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还是用于去除其他食物的苦味、用作处方药甚至宗教誓言，糖在许多人类活动中的用途数不胜数。多个世纪以来，“糖”“甜”“蜂蜜”这些词语代表着人生中最开心的时刻和最美味的感知。“糖”或“蜂蜜”成了心仪之人的爱称，常用于称呼我们的所爱之人。大部分人都能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称别人“宝贝”的时刻。为什么夫妻要在婚礼之后和婚姻生活正式开始之前，首先开启一场“蜜月”之旅呢？这一浪漫之旅传递着我们嗜好甜味的这一本能，以及对所爱之人最细腻的感情。

2006年，有一部电影的名字叫《糖果》，而电影的另一个名称就是《迷幻甜心》……

一想到甜，我们就会想到糖。不过，在蔗糖对人类产生深远影响之前，蜂蜜一直是古代社会很多甜味的主要来源。多个世纪以来，阿拉伯和波斯的文献曾多次提及当时厨艺及宗教中使用的甜品。甜味能够带来世俗快乐的体验，那是一种愉悦、开心甚至有些奢侈的生理感知——与之相符的是来生甜蜜的许诺。在许多宗教信仰中，天堂般的快乐都表现为各种形式的甜蜜。在世俗社会里，这种快乐的形式就是蜂蜜。

中国最初的糖出现在西周时期，叫作饴。所谓饴糖，就是由玉米、大麦等粮食经发酵糖化而制成的食品，简单来说，就是用谷物发酵造出的糖，呈黏稠状，俗称麦芽糖。宋代诗人宋祁的《赴直马上观市》诗中有“墟喧涤器市，箫暖卖饧天”，卖的正是麦芽糖。

后来随着甘蔗种植和蔗糖提炼方法从古印度传入，蔗糖渐渐兴起。在中国，早在东周时期就出现了甘蔗种植的记载。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时代，已有对甘蔗初步加工的记载。人们依靠甘蔗制出的糖被称为砂糖。这里的蔗糖完全不同于今天的概念，它十分粗糙。季羡林先生在《糖史》一书中提出：当时中国本土的蔗糖制糖术，只知道熬煮浓缩甘蔗汁，制造硬得像石头一样的褐棕色粗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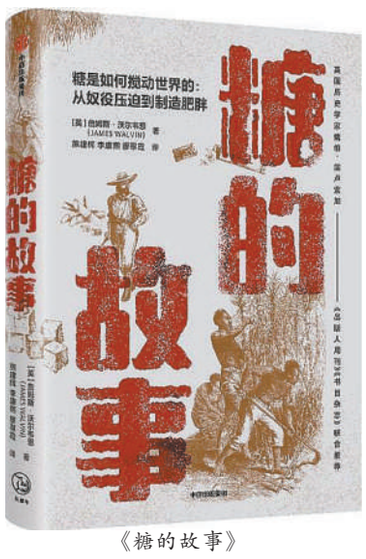
唐宋年间，已经有成规模的制糖作坊出现，红糖、白糖依次问世。季羡林先生认为，这是由印度传入的制糖术，松散红糖是通过在炼糖过程中加入碱制成的。因此红糖在我国具体起源时间为“始于三国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之间的某一时代，至少在后魏以前”。而红糖用法在《千金要方》《食疗本草》等药典中均有记载，可见其最开始是作为药品来使用的。

所以，早期制糖阶段，饴糖相对而言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有关于饴糖的记录。《诗经·大雅》中写道，“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意思是说周的土地丰硕肥美，就连堇菜和苦苣这种野菜都像饴糖一样甜美。《周礼·天官·疾医》将“饴蜜即甘”列为五味中“甜”的代表。关于饴糖的制作方法，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其著作《齐民要术》中有记录：“用粱米、稷米者，饧如水精色。”宋朝的药学家寇宗奭在其著作《本草衍义》中说，制作饴糖的最佳原料应当是“糯与粟米作者佳，余不堪用”。

我们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古人不用西瓜做糖？据说是因为西瓜太“水”了，出糖率不高。民间有说法称，神农尝百草时发现“稀瓜”，意思是水多肉稀的瓜，后来传着传着就变成了西瓜。一颗西瓜含水量约有92%，含糖量仅约5%左右，反观甘蔗，含糖量可以达到17%，甜菜根含糖量可达19%。如今的西瓜很甜，是无数代培育和改良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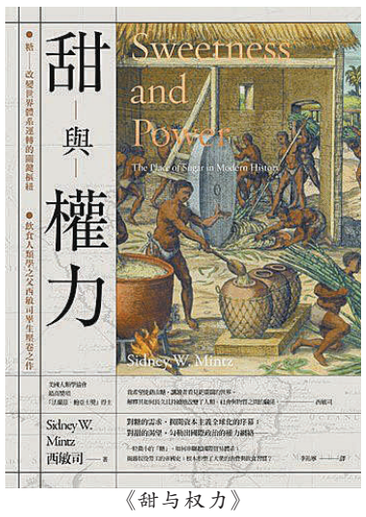
公元前4世纪，中国已经有种植甘蔗的记录。战国时期的《楚辞·招魂》中写道：“胹鳖炮羔，有柘浆些。”这里的“柘”就是甘蔗，“柘浆”即是甘蔗汁。这表明，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对甘蔗进行原始的加工，并将其熬成浓浆用来增甜，但当时的人们还不懂得如何将其加工成糖。自唐朝以后，甘蔗制糖进入手工业的发展阶段，已经形成了作坊式的制糖业。据《新唐书》记载：“贞观二十一年，始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诸蔗，榨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记录了公元6世纪唐太宗派人去印度学习熬糖法的事迹。

正因为人类对糖这种味道的情有独钟，东西方对甜蜜的追寻异曲同工。



《糖的故事》

《食疗本草》



《甜与权力》

2.

从2.6万年前的岩画和古埃及、古印度的绘画中可见，蜂蜜是当地甜味剂的重要来源。古时有很多证据表明蜂蜜的普遍用途，如甜味剂、药材乃至成为一种宗教象征。在众多的古典文献中，点缀着各种关于蜂蜜的意象。荷马在《奥德赛》一书中写道：“谁也不曾驾着乌黑的海船，穿过这片海域，不想听听蜜一样甜美的歌声，飞出我们的唇沿。”早在公元前1世纪，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就提到，罗马医生用蜂蜜引诱孩子吞下难以入口的苦药：“医生试图把令人厌恶的苦艾拿给小孩子去吃时，先在杯口涂上甜甜的黄色蜂蜜。”（《物性论》）当然，也许更为人熟知的是《圣经》中大量有关蜂蜜的意象。耶和华带领古代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他带着他们来到“流奶与蜜之地”。

在穆斯林的生活中，蜂蜜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古兰经》中经常提及甜品：“享用蜂蜜是一种信仰。”一直以来，蜂蜜既是一种甜味剂，又是一种宗教象征。数个世纪以来，蜂蜜是医学和药物学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无论是在古代中国、印度、希腊还是伊斯兰国家，蜂蜜都是治疗多种疾病的药方。伊斯兰医生和中世纪的医生，用蜂蜜和其他成分混在一起就可以入药，就如同后来的蔗糖一样。时至今日，在世界许多未受现代医学影响的地区，蜂蜜仍然被用作药物。它还被用于多种“替代”疗法之中，这些疗法最近在世界上广受青睐。

在许多古代文明中，蜂蜜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蜂蜜本身就是一种食物，同时也是食谱和菜单中一种惯用的原料。蜂蜜代表着纯洁和高尚的品德，《圣经》和《古兰经》中都描述过一种富裕的来生生活，有着牛奶、蜂蜜等珍贵的佳肴。居家过日子也与蜂蜜有关。例如，在刊载最高级的波斯-伊斯兰菜肴的《巴格达食谱》中，记载了8至9世纪的300多种食谱，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菜肴和饮料是加糖的，如甜甜圈、油炸饼、薄煎饼、米饭类菜品、果子露和其他饮料。

1425年，航海家为马德拉群岛的早期殖民者提供了来自西西里群岛的甘蔗。到15世纪末，这个岛屿生产了大量的蔗糖。蔗糖很快就在马德拉群岛证明了它的独特价值。这个无人岛屿吸引了葡萄牙殖民者前来开垦土地。在热那亚和犹太金融家的帮助下，他们在岛上种植了小麦和甘蔗。从此，蔗糖成为马德拉群岛利润最丰厚的商品。15世纪末，马德拉群岛成为西方世界最大的产糖地。同样，这里也雇用了来自非洲和加那利群岛的奴隶。

西班牙人把多种作物带到加勒比海地区，他们细心探索，尝试着一种又一种农作物。然而，他们很快就将目光转向了甘蔗种植和加工。糖引发了一场对人类乃至生态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革命。这场“糖的革命”改变了加勒比海地区的面貌。它永远地改变了这里的自然栖息地、地貌和人口。

我们可以在《不吃糖的理由：上瘾、疾病与糖的故事》中读到，直到19世纪40年代，非洲奴隶一直是美洲地区最伟大的拓荒者。现在看来，受非洲化影响最为深远的美洲地区是巴西、北美和从佛罗里达南端延伸至南美洲东北端的面积超过2000平方英里的众多岛屿。据记载，有1200多万非洲奴隶被装上船，但只有1100多万人活着踏上美洲的土地。曾经的跨大西洋小规模的奴隶贩卖，逐渐演变为近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强迫性人口迁徙。

而这本书的作者、著名科普作家加里·陶布斯认为，香烟本身的成瘾性和危害可能都没有糖大。

3.

2015年，有一部著名的电影《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上映。电影中有漂亮的巧克力工厂，工厂里有小矮人，有最纯的巧克力，有用糖果做成的房间，有可以把物体传送到电视里的装置……这是一段带有魔幻色彩的奇妙旅程，同时把孩子们对甜蜜口味的追求放大到了极致。

这部电影过于出名，于是2023年，就有了这部电影的前传《旺卡》。《旺卡》建造了一个用巧克力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童话世界，其实这就注定巧克力已经不单单是一种食物，而成了一种权力或财富的符号。电影中的反派独揽巧克力原浆的资源，决定资源分配、市场定价，教会教父、政府警官受巧克力控制，从而形成一种隐形的权力。这与糖的历史何其相像。

“饮食人类学之父”、著名学者西敏司在《甜与权力》中写道：“种在地里的甘蔗和倒在我杯中的白糖，两者同时出现在视野里自然会产生一种神奇感。但在我看来，这种神奇感也应该在另一种场景里发生：一面是熔化的金属或者更恰切地说是原初的铁矿石，另一面是一副完美无缺的精制的手铐或脚镣。”

当糖摆脱了稀缺资源的冠冕之后，当英国工人阶级下班之后可以轻易喝到一杯甜茶时，掌控糖的权力才逐渐消减。《糖的故事》告诉我们，直到18世纪以后，随着产糖的蓄奴岛屿向欧洲出口越来越多的糖，糖成为人们每周必购的日用品，其次是咖啡和茶叶。当家庭主妇去杂货店购物时，她们很有可能会同时买糖和茶叶。如果有人不知道去哪里买糖，那就去最近的药房好了。在日内瓦，一家本地的药房将糖放在漂亮的瓷罐里，并用法语标上“冰糖”。

当时，不仅各种商店和批发店为穷人和富人提供充足的糖，而且还出现了另一个与西方人嗜糖成瘾相关但却往往为人忽视的社会特色。糖成为如此普通的家庭生活用品，以至于到18世纪中期，生产商制造了成千上万的糖罐。在大西洋两岸的餐桌、咖啡桌和茶几上，糖罐已经司空见惯。中国陶瓷行业向西方国家出口了数十万件瓷器，供人们享受甜茶和咖啡——欧洲人直到18世纪20年代才学会制造瓷器。在此过程中，他们也学会了生产糖罐。欧洲及后来的北美工匠和制造商用各种材料效仿中国人生产糖罐以竭力满足市场需求。

在《糖的故事》的作者看来，人们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精美糖罐，但却对那些非洲奴隶的困境一无所知，因此这种甜蜜的享受中有着不可饶恕的罪过，正是后者在遥远的热带地区种植甘蔗，推动着糖业的蓬勃发展。

我们不可能把砒霜和糖并列，但是，当权威专家在国际顶级学术刊物《自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糖的毒性真相》的文章时，这让我们有点猝不及防：糖真的成了一种威胁健康的炮弹。当人们发现日常饮食离不开糖的时候，而糖又带来了无处不在的风险，比如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我们会纷纷找到《戒糖》这样的书，找到我们嗜糖成瘾之后的健康出路。于是，当初那些引诱人们寻觅“甜蜜蜜的生活”的商人们，开始在自己的商品上标注“无糖”。因为糖超标和防腐剂超标一样，会给人们带来无尽的麻烦。

“甜于糖蜜软于酥，阆苑山头拥万株。”大概，今天的我们不会像古人这样沉迷于想象的豪奢了吧！

书评

邂逅不一样的江湖

李钊

金庸笔下的江湖世界，有剑胆琴心、侠骨柔情，更有历史过往、社会风情，我们时常沉迷江湖历史里的热血故事，却往往忽略历史江湖里的鲜活人间。宋史研究者吴钧所著的《细读金庸：一部严肃的古代社会史》，是一部从历史视角解读金庸的新作。全书以金庸武侠小说中部分细节为切入点，从服饰美食到婚恋习俗，从武器武功到社会制度，对古代社会生活的多个侧面进行系统考证，呈现了大历史背景下人物的生活日常。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创作的武侠作品，总是将武侠传说熔铸在真实的历史背景里，可小说毕竟是虚构的艺术，侠客们的生活距离我们仍十分遥远。当我们从历史的视角走进侠客生活的社会背景，条分缕析他们的衣食住行，所见不再是成年人的童话，而是人物最真实的一面。

酒，是侠客行走江湖的伴侣，金庸小说不乏善饮的豪侠，乔峰豪饮四十碗酒而不醉，而令狐冲却时常酩酊大醉，究竟是两者酒量相差悬殊，还是所饮之酒藏有玄机？作者沿着酿酒历史发展的时间轴，从酿酒原料、酿造技术、酒品度数等方面进行解读，分析出乔峰在宋朝所喝的是未经蒸馏的低度黄酒，而令狐冲在明朝所喝的是经过蒸馏的高度白酒，两者的酒量并不具有可比性。

一篇《杨过如何剪指甲》，作者并没有紧盯独臂的杨过单身十几年如何剪指甲的问题不放，而是从古人剪指甲的工具发展历程进行阐述，从汉代起源的交股剪刀发展到五代后的双股剪，从女性梳妆盒内的剪子到士大夫文具匣内的刀锉，从专业修面修甲的刀镊工到古人修剪指甲的观念，呈现出一幅真实而接地气的古人生活图景。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武侠世界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侠客，他们“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似乎不受任何法律制度的约束，只受侠义精神的感召，但这仅仅是人们的想象。如果剥去金庸武侠小说的外衣，可以发现，与侠客们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们，从未脱离制度的约束和风俗的影响。郭靖和黄蓉是金庸小说里令人艳羡的神仙眷侣，书中有郭靖和欧阳克同时向黄药师提亲，洪七公指出欧阳锋没找媒人而不符合礼制的细节描写。作者以此为引，深入分析宋代婚姻制度规定，并援引文人笔记、世情小说等的记载，还原宋代婚姻缔结礼俗程序、仪式等鲜为人知的一面。颇有意味的是，作者指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并不是指新人没有自主权，只能屈从父母摆布的包办婚姻，而是缔结婚姻必须履行的一道程序而已。串联起作者所写的后续五篇文章，擘画出古人婚姻和生育的生活场景。

仗剑走天涯，江湖的最大特点便是流动性，即允许人口的自由流动，否则怎么走江湖？秦汉至隋唐，就有限制流动性、禁止人口自由流动的社会制度，叫“过所”。简单来说，就是人们不能私自出远门。实在要出远门的，要先跟有关部门申请一张“过所”，要说清楚你出门做什么、去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回来、你不在的时候谁给你承担赋役等等。基层单位逐级上报，签字批准，“过所”才能拿到手。“过所”上会注明持有人的姓名、身份、年龄、所携带随员的身份与人数、所携带财物数目、往返的地点等等。政府会在各个关卡勘验，没有携带“过所”出关的人，会被当场问罪。

明代就更加可怕了，这个充斥着锦衣卫和西厂东厂公公的时代，根本不适合江湖侠客与绿林好汉生存。明初，朱元璋颁布法令，要求士农工商四民都必须固守本业，农民老老实实待在农田上，不可脱离农业生产。弃耕从商是被禁止的，农民也不准脱离原籍地，每天的活动范围都应该控制在一两里之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即便碰上饥荒，逃荒外出，官府也有责任将他们遣送回原籍。实在需要出门的，就跟汉唐一样，办个“路引”。擅自出远门，后果很严重，轻则打板子，重则充军、处死。南京修建了一座“逍遥楼”，但凡市井中有下棋的、养鸟的、游手好闲的，都会被抓起来，关入逍遥楼，不送水不送食，让他“逍遥”个够……

这种限制措施宋代就松懈多了。宋代只有类似身份证一样的东西，走州过县都是自由的。而且宋代的坊市空前繁荣，人们沿河设市，临街开铺，到处都是繁华而杂乱的商业街。有了坊市与自由，江湖就形成了。宋代为江湖人士创造了生存的空间，不管是“月黑风高杀人夜”，还是“夜深灯火上樊楼”，江湖中适合在夜晚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在宋代实现。

作者写郭靖、黄蓉，也写韦小宝、乔峰，以郭靖第一次请黄蓉吃饭的花销、江湖门派的经济收入等故事情节，分析古代经济社会状况，从江湖社会的形成、大侠带刀犯不犯法等角度分析解读古代社会制度和武器武功，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在社会生活细节里邂逅一个别开生面的江湖世界。

江湖里，人世间。《细读金庸：一部严肃的古代社会史》一书让我们对江湖侠客的了解更进一步，对真实的历史认知更深一层，更在历史细节中邂逅不一样的武侠江湖。而当我们再度阅读金庸武侠小说时，不妨换个视角，将“侠”放置于当下的语境之中汲取新的力量。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1.00元 全年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61号）